



# 人工智能在司法审判中应扮演什么角色

## 最高法文件指出其永远不能代替法官裁判 将为公正司法提供辅助支持

向改革创新要动力

□ 本报记者 张晨

近期,以ChatGPT为代表的大语言模型声势浩大,迭代迅猛,引起广泛关注。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学习方式。随着这项新技术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应用愈发广泛,其在司法领域的应用也渐趋普遍,由此衍生的关于新机遇和新挑战的讨论方兴未艾。

### 人工智能不能代替法官裁判

今年1月30日,哥伦比亚一名法官借助ChatGPT作出了一份关于自闭症患者免于支付治疗费用而获得医疗服务的法庭裁决,有人称该案为“全球AI审判第一案”。

3月15日,GPT-4上线,作为新一代人工智能产品,其已经具备通过法律职业资格测试的能力。

人工智能替代人类的担忧再起:照此速度发展下去,中国法院未来会不会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判案?

在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徐燕看来,就人工智能的技术现状和固有局限性以及法律审判的复杂性而言,ChatGPT还无法成为“真正的法官”。普通民众的心声是,人类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应该交给有情感的人类来守护,而不应该交给一个冰冷的“按钮”。人工智能无法替代法官,也不应替代法官。

徐燕认为,关于人工智能在司法审判中的作用,在上述哥伦比亚法院判决书中有明确表述:“在判决中加入这些人工智能应用的生成文本,其目的绝不是取代

法官的裁判,我们真正追求的是在对人工智能提供的信息进行确认后,减少起草判决书的时间。”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国际合作局副局长何帆表示:“在中国法院,人工智能可以辅助法官办案,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代替法官裁判。”

“过去,社会上确实存在一些担忧,认为法院办案负担那么重,技术发展那么快,未来会不会有‘机器法官’,‘机器裁判’会不会有碍公平正义的实现。”何帆指出,去年12月,最高法印发《关于规范和加强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意见》,开创性提出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五个基本原则,其中之一是“辅助审判原则”。

《关于规范和加强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意见》明确,坚持对审判工作的辅助性定位和用户自主决策权,无论技术发展到什么水平,人工智能都不能代替法官裁判,人工智能辅助结果仅可作为审判工作或审判监督管理的参考,确保司法裁判始终由审判人员作出,裁判权始终由审判组织行使,司法责任最终由裁判者承担,各类用户有权选择是否利用司法人工智能提供的辅助,有权随时退出与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的交互。

“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司法裁判始终由审判人员作出,裁判权始终由审判组织行使,司法责任最终由裁判者承担’。换言之,无论是‘疑难杂症’,还是简单案件,最终决定判多少年、赔多少钱的都应当是人类法官。”何帆说。

### 作为辅助性而非替代性工具

“网上自助立案”“跨域立案”……如今,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现代科技在诉讼服务、审判执行、司法管理等领域广泛应用,中国特色的网络司法模式在提高司法效率的同时,减轻了各类司法人员工

作负担。

在纷繁复杂的司法审判流程中,如何给人工智能以正确定位,发挥其优势,避免其弊端?

何帆指出,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司法领域的应用范围很广泛,既有信息回填、智能编目、法条推送、文书纠错等事务性辅助工作,也可以为法官提供类案推送、证据筛查、风险预估、偏离度预警等实质性帮助。

“但实体性的应用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人工智能能不能用来分析研判疑难案件、预警提示重大证据瑕疵,还需要我们做很多‘打基础’的工作,不能盲目乐观、好高骛远。”何帆透露,最高法目前正在清华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合作,依托海量的司法大数据资源,推动建立面向司法语境的大规模预训练语言模型,提升机器理解、学习法律知识、裁判文书、司法逻辑的能力,为司法人工智能长远发展提供支持。

徐燕认为,法律的基本功能是定分止争,但定分只是手段,止争才是目的。法律运行绝非自足自治,而是深受社会价值观念的深刻影响。司法活动注重其与社会关系的沟通,注重情理、法的交汇与统一,要求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审判实践之中。在我国,审判工作中通常鼓励法官通过引导当事人息诉的方式化解双方之间的矛盾,以实现“调解结案”所带来的社会和谐效果。但人工智能本身并不具备感情,ChatGPT法官无法做到与人类情感共鸣,无从“感同身受”,不能对当事人进行情绪疏导,妥善解决矛盾。

“司法审判是一个兼具事实认定和价值判断的活动,为了扬长避短,可以将ChatGPT置于事实发现者的角色,尽量不使其作出价值判断。这就决定了不得允许人工智能直接对司法裁判进行决策,同时避免其对法官办案形成实质性干预。”徐燕说,“应该推动人工智能

作为辅助性而非替代性司法实践工具的功能,将其定位为‘法官助手’。”

### 勾勒智慧法院建设未来图景

“近年来,我国法院系统一直以积极主动的姿态拥抱数字化变革,通过一系列举措积极促进司法与科技深度融合发展。”北京大学法学院研究员吴洪淇梳理发现,在已推出的在线诉讼规则,在线调解规则,在线运行规则基础上,2022年,最高法再度发布两个重要文件,加强区块链、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直面智慧法院建设中的关键问题,为智慧法院建设未来图景勾勒出清晰的发展方向,推动智慧法院建设迈向更高层次。

“这两个文件为智慧法院下一步发展提出了清晰的方向,以2025年和2030年为时间节点,为快速发展的区块链和人工智能司法应用明确了建设目标,提供了基本指导方针。”吴洪淇说。

其中一个目标是,到2025年基本建成较为完备的司法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体系,为司法为民、公正司法提供全方位智能辅助支持,显著减轻法官事务性工作负担,有效保障廉洁司法,提高司法管理水平,创新服务社会治理。

人工智能在司法领域的应用中,如何保护当事人隐私,确保数据安全和算法的透明度?许多问题仍悬而未决。天津市律师协会副会长牛同桐认为,科技是一种工具,工具的价值就是替代人类的重复劳动和个体人类不擅长的重复计算,而ChatGPT模糊了人类行为和人工智能行为的边界,在法律上可能存在侵犯知识产权的风险,需要对其输出内容作进一步的讨论。

“面对未来,不仅是法院,整个法律共同体都要加强对新领域新业态的了解。”牛同桐说。

# 重点项目在哪里 警务保障就跟到哪里

银川公安主动作为构建亲清营商关系

□ 本报记者 申东 □ 本报通讯员 郎中卿

持续推进“365天×24小时”政务服务,在全市工业园区成立15家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站……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公安局提前谋划,主动作为,创新开展多项利企工作,形成从“单打独斗”到“警企联动”,从“被动应付”到“主动服务”的工作新格局,为优化营商环境保驾护航,助力经济有序发展。

### 项目警长变身“店小二”

日前,银川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济民路派出所辅警李志成对辖区一家企业开展危险化学品安全检查,“主要看企业人防物防是否到位,特别是安防系统的安装,存放化学品的仓库有无内部台账管理制度。”有着服务企业11年经验的李志成在检查中发现一些问题,及时提醒企业负责人,要求企业一定要做好各项安全生产防范工作。

开发区公安分局落实“项目警长制”,通过警企联动,创新开展“百警联企”服务机制等方式,为辖区企业健康发展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和高效的警务服务。分局确定民警、辅警108人,服务108家园区企业,民警、辅警与联系企业分别签订责任书,明确工作职责,同时,在三家重点企业设置“经开区警企联防”警务室。

“现在企业已经形成了‘有事就找派出所’的习惯,警企联系很紧密。”李志成说,“去年疫情期间,为保障重点工程建设不停工,企业正常运营生产,派出所民警直接住进企业建设工地,做到突发事件第一时间出警,问题隐患第一时间摸排,矛盾纠纷第一时间化解。”

“哪里有点工程项目,我们就将警务服务保障工作跟进到哪里,扎根到哪里,竭力为优化营商环境贡献银川公安力量。”银川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告诉《法治日报》记者,银川市公安局聚焦“六新六优六特”等重点项目和重大产业,以167名项目警长结对160家关联企业,项目警长定期对包抓企业进行深入探访,了解需求,提供服务,定期帮扶,多措并举解决制约企业发展难点、痛点、堵点问题,同时协调解决企业经营和项目建设中涉及的治安问题,将各类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双赢目标。

### 便民利企服务“全天候”

“信息采集设备这么智能和先进,两分钟就采好了签名,指纹,为你们的优质服务点赞!”近日,企业家党先生向银川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办证大厅办理护照业务时赞叹道。

近年来,银川公安靠前为企业提供优质高效服务,积极营造良好营商环境,用心用情为企业纾困解难,全力为推进先行区示范市和创新发展引领区建设贡献公安力量。

银川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抢抓全市“放管服”改革机遇,开设“惠企专窗”,提供“专人导办、一窗办结”快捷服务,从细节入手,点滴做起,把尊重企业家、服务企业家的承诺和惠企举措做细做实。

事必有法,然后可行。银川市公安局紧盯问题导向,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纵深推进公安“放管服”改革,根据办件量和群众需求将“365天×24小时”政务服务受理点位由73个优化为37个,将原有93项办事事项优化为81项,不断优化融合户政、交警和出入境业务,推动“一窗通办”“一网通办”,让“只跑一次”成为常态。去年以来,全市公安机关共办理政务服务260余万件,非工作日、节假日和8小时以外办理事项超10万件,企业、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显著提升。

### 知识产权保护“定制化”

知识产权保护是企业市场竞争力的核心要素。银川市公安局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侦查支队针对企业普遍存在的知识产权管理保护意识不强等问题,在银川市8个重点园区选取15家知识产权密度大、保护需求高的重点企业建立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站,搭建企业与公安机关之间的信息沟通“绿色通道”,针对不同企业需求提供精准服务。

据了解,银川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目前已探索,打造出“警企零距离”知识产权保护新模式。2020年,该支队通过该模式成功破获宁夏20年来首起侵犯商业秘密案,为园区企业挽回了近千万元经济损失。

作为银川经开区高新技术龙头企业,被侵权的某公司是我国矿山智能装备研发和应用领域的前沿企业。2017年,该公司曾和北京某科技有限公司开展代理合作。合作期间,犯罪嫌疑人马某向竞争对手非法披露公司核心技术,银川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接到报警后,立即立案侦查,通过对相关互联网公司数据进行穿透分析,成功锁定案件核心线索,有力打击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行为,进一步保护了该企业商业秘密。

同时,银川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依托已建成的15家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站,将8个重点园区内的30家企业列为年度服务对象,制定企业走访推进表,细化任务分工,由民警辅警“点对点”负责,每人按园区包干3家企业开展工作。通过走访调研,广泛征求听取意见建议,收集案件线索,接受举报,筛查风险,提高企业商业秘密保护意识,为企业核心技术保护提供“定制化”服务。



3月23日,贵州省黔西市人民检察院在钟山镇开展法治宣传志愿服务活动,向各族群众讲解关注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网络安全、反诈知识,不断提升群众的法治意识。图为检察官在指导群众安装“守未联盟”。

# 事前司法预警 事后碳汇补偿

## 福建晋江法院创新方式推动生态环境治理

□ 本报记者 王莹 □ 本报通讯员 尤燕玲 陈瑜滨

近几个月来,在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永和镇后埔村山场,一个身影每天穿梭在山林里,悉心呵护着补植树木,巡逻察看有无滥伐林木等情况。这名特殊的“护林员”是一起失火罪刑事附带民事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当事人,他正在用“劳役代偿”的方式履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

2020年8月,张某在其租种于后埔村的田地里点火焚烧杂草堆引发森林火灾。2022年4月,这起泉州市首例“碳汇补偿+劳役代偿”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在晋江市人民法院宣判。

考虑到张某拮据的家庭情况及失火地生态修复的紧迫性,晋江法院判决其对过火林地按照“碳汇补偿”生态修复方案种植林木,并在永和镇灵秀山脉架网格开展林地管护,营林等“劳役代偿”工作,将所获报酬用于替代支付生态修复功能总损失费用。

“张某种植的相思树基本覆盖了失火林地,长势喜人。”近日,晋江法院法官会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再次来到该山场进行中期回访,共同实地检查了补植树木的种植面积、栽植密度、苗木成活率,对张某的“劳役代偿”效果表示肯定。

近年来,晋江法院将生态环境审判工作自觉融入晋江市委、市政府“品质城市建设”工作大局,丰富公益诉讼多元修复模式,落地“碳汇补偿+劳役代偿”修复机制,不断满足群众生态司法需求。同时,晋江法院推动“生态司法+执法+社矫三位一体衔接规则”升级优化,并在全省首创“环境污染再犯阻断机制”,出台污染环境犯罪人员“从业禁止”,“从业禁止”污染防治方式被评选为福建生态环境司法十大修复方式之一。

2021年以来,晋江法院共计对13名涉及重金属污染犯罪、2名涉及非法采矿犯罪的被告人判处“从业禁止”,“从业禁止”污染防治方式被评选为福建生态环境司法十大修复方式之一。

在生态环境资源司法保护工作中,晋江法院不仅重视“事后惩治”成效,还不断在“事前预防”

上发力,积极构建司法预警机制。

除了向重点排污单位发布污染环境司法预警书,晋江法院还组织举办污染环境法律责任专题讲座,在污染环境案地开展巡回审判等方式,并打造集普法宣教、庭审直播、实时监测、动态监管于一体的环境污染执法司法联合预警平台,实现向辖区企业单位的司法执法“点对点”即时服务。

为凝聚协同保护合力,晋江法院创新靠前服务机制,强化与各部门联动,在林长办、河长办、生态环境局、农业农村局4家单位设立法官服务站、工作室,与环保、林业等单位联合设立生态环境资源司法保护宣传站,与教育局、学校共建生态司法教育实践体验馆等。

“深化协同共治,我们能够及时掌握辖区内生态环境资源等保护情况,进一步提高工作的针对性、创造性,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提供有力司法保障。”晋江法院生态环境审判庭庭长许逢其说。

一个菜店的经营者说。他意识到,这件事如果处理不好,两家会结怨,便联合物业工作人员,“十户联防”小组组长迅速登门了解情况,征求意见,妥善化解了这起纠纷。

“平安是最大的民生。”郑州市公安局中原分局政委孔安介绍,中原区是市委、市政府所在地,辖区人口近百万,治安状况复杂,分局党委以警情民意为导向,积极推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探索实践的沿街商户“十户联防”机制,以稳定治安和服务群众为着力点,由社区民警组织沿街商户组成“十户联防”,一旦出现突发情况,在相互配合下可以更快应对和处置,从而提升基层派出所快速反应和协同作战水平。

“平安是最大的民生。”郑州市公安局中原分局政委孔安介绍,中原区是市委、市政府所在地,辖区人口近百万,治安状况复杂,分局党委以警情民意为导向,积极推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探索实践的沿街商户“十户联防”机制,以稳定治安和服务群众为着力点,由社区民警组织沿街商户组成“十户联防”,一旦出现突发情况,在相互配合下可以更快应对和处置,从而提升基层派出所快速反应和协同作战水平。

# 建立‘法治观测点+法治观察员’制度

## 重庆南川做深做实常态化法治督察工作

□ 本报记者 战海峰 □ 本报通讯员 刘敏 谭佳

从去年开始,为进一步加强治理现代化建设,更好发挥法治在助推乡村振兴、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效能,南川区在重庆市率先探索建立“法治观测点+法治观察员”制度。

“法治观测点”设立在南川区政务服务中心、市场监管、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信访联席会议办公室等重点领域,基层服务平台,共12个。

据南川区司法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法治观测点”主要负责收集和反映本领域存在的法治问题,全区工作制度和措施在本领域实施情况,需要区委依法依纪统筹推进的工作中重大法治事项;社会影响较大、群众反映强烈或舆情突出的重大法治事件;与群众利益息息相关的小事、难事、身边事等。

“法治观察员”则是一支包含“两代表一委员”(党代表、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一庭两所”(人民法院、司法所和派出所)负责人、公益诉讼观察员、人民监督员、人民陪审员、行政执法监督员和网格员在内12类、共149名观察员的队伍,负责收集区域内法治问题线索,整理上报,并提供意见。

“法治观察员在反馈问题时,采取定期反馈与实时反馈、集中座谈与个别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南川区司法局有关负责人说,观测点每半年至少反馈1次信息,观察员每年至少反馈1次信息,既保障工作质量又避免增加基层负担。

同时,针对实时收集的问题、建议,法治观测点和法治观察员充分运用微信、电子邮箱等渠道,按照“收到信息—甄别过滤—调查核实—提出方案—向上反馈”流程来处理,形成“发现问题—情况反馈—分类登记—分流处理—督促整改”整套工作闭环,做到事件全部落实解决。

其中,南川区委依法依纪办对能够及时解决、督促指导相关单位推进落实;对短期内不能解决的问题,要求相关单位作出合理解释或提出解决方案,承诺解决时限;并根据全面依法治国考核的结果,及时清退未能良好履行职责的法治观察员。

目前,南川区委依法依纪办已牵头开展培训、座谈会14场,收到法治问题和意见建议78件,经核实、审核后,归类归项发出工作督办单9件,提示单5件,建议书2件,城区停车治理等14个问题得以有效解决,其他建议在推进处理中,效果初步显现。

南川区司法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坚持问题导向,完善“法治观测点”建议收集、反馈督办等机制,培育并用好“法治观察员”,做深做实法治督察工作。

# “联”成合力 “防”出平安

## 郑州中原公安“十户联防”惠民安民

□ 本报记者 赵红旗 □ 本报通讯员 郭建峰

家人外出上班,家里有什么事怎么办?在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不少居民会脱口而出:“沿街商户‘十户联防’!”

前不久,老李84岁的父亲走失,报警求助后,郑州市公安局中原分局绿东村派出所社区民警王前光迅速在沿街商户“十户联防”微信群里发布求助信息。

很快,各有关信息就传了过来。“老人两个小时

从我家店前路过”“我在店里搬卸货物时,看到老人往南边走了”……

经对相关信息研判,王前光精准判断老人走出的方向,后与老李去寻找,最终在一路口的绿化带旁找到了老人。

王前光介绍说,他负责的社区有100余家沿街门店,按照相邻、就近的原则,将10家商户组成一个联防小组,推选信用基础好、群众口碑高、热心公益事业的商户为组长,共同参与治安联防、纠纷化解和法治宣传教育等工作。他牵头为每个联防小组建立微信群,在微

信群中及时发布防火防盗等警情信息和安全生产、预防诈骗等常识,提高商户联防联治的意识与能力。目前,他已组建11个沿街商户“十户联防”小组。

“沿街商户熟悉周边小区的情况,能够更好发挥人熟、地熟、情况熟的优势,联防联防模式由静态转变为动态,进一步增强了辖区群众群防群治的能力,营造出平安和谐的环境。”绿东村派出所所长王俊伟说。

“老李到店里买菜时说,邻居在门口堆放杂物,影响了他的出行,他准备‘理论’一番,两人会不会闹出什么事?”昆仑社区民警皇甫深斌在走访沿街商户时,